長庚人文社會學報

3:2(2010),303-341

江上行舟:「水域空間」在明清話本中的構設

郭璉謙*

摘 要

對於「水域空間」在小說中如何構思,乃至於影響小說情節的鋪陳,少有學者討論。既然水運在明清時期佔有極高重要性,而古典小說中也不時將「水域空間」作爲場景之一,於是產生幾個課題:作者如何有效運用水域空間來鋪陳小說情節?而水域空間上所發生之事,對於小說進展是否有所影響?還是僅作爲交通作用?明清時期爲話本小說出版量最爲豐碩的時期,本文選擇數部明清話本,首先,擬分「旅遊」、「經商」、「任途」及「兩地往返」等項目,說明水域空間在小說中的「正常功能」;接著,則是透過「避難」、「逢禍」、「藏匿他人」、「棄屍」、「偶遇」等現象,進一步探討小說家如何運用構設水域空間,以便鋪展小說情節。

關鍵詞:古典小說、話本、擬話本、水域空間、情節結構

^{*} 作者爲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實踐大學博雅學部兼任講師,E-mail: morestand@gmail.com。對於二位匿名評審人所提之修改意見,作者深感謝意。

1. 前言

關於「水域空間」在古典小說中的展現,學者通常著重於因運河開通而逐漸生成的城市風貌及商賈貿易等此類文化或經濟層面,如葛永海在《古代小說與城市文化研究》一書中,即分析過《金瓶梅》裏頭邊臨運河的城市臨清,亦曾討論過明清小說中沿著大運河的杭州、蘇州及楊州等城市。1此外,尚有趙維平所撰的《明清小說與運河文化》,該本著作簡要地說明中國古代運河的發展演變,接著論述運河如何造就中國政治中心、經濟重心及文化中心的東移,最後分析《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紅樓夢》及《儒林外史》與運河文化的關連性。2

然而,對於「水域空間」在小說中的如何運用,乃至於影響小說情節的 鋪陳等方面,少有學者予以討論,可見者大概僅有大陸學者李桂奎在《元明 小說敘事型態與物欲世態》中的一小節,該節分成橋邊(橋市)、船上及水邊, 所探討的範圍則爲「三言兩拍」。3「水路」是過去中國相當重要的交通路線, 舉凡經商、漕運等,皆按水路而行,甚至達到南貨北送、北貨南運的目的, 從而促進經濟貿易的成長。臨近運河或河道的城市憑著交通便利之故,也常 成爲政治、經濟、文化的重鎭,如臨運河者,自明代開始,由北而南,即有 通州、天津、臨清、張秋、濟寧、淮安、揚州、鎮江、常州、無錫、蘇州、 杭州等,形成一條以運河商路爲依托,以沿運城鎭爲載體的商貿經濟帶。4除 了以上所言的臨運河城市,常在小說中出現,濱臨河道的鄉鎭如德清、鳳陽、 合肥、宣城、休寧、桐廬、南昌、成都、順慶、和溪、武昌、湘潭、溫州、 永嘉等處,亦常爲小說人物的居處地。小說圍繞著沿江河湖海的大小城鎭爲 故事發生地,正如論者所言:「明代的白話短篇小說大多以運河兩岸繁華的 城市、碼頭爲故事背景,眞實地爲我們再現了一幅明代運河文化的風俗畫

¹ 葛永海(2004),《古代小說與城市文化》,第三、四、六、七章。

² 趙維平(2007)。

³ 李桂奎(2008),《元明小說敘事型態與物欲世態》,頁 84-92。

⁴ 安作璋主編(2001),《中國運河文化史》中冊,頁1185。

卷。」5

既然水運在明清時期佔有極高重要性,而古典小說中也不時將「水域空間」拉入其中,作爲場景之一,於是,產生一問題:作者如何有效運用水域空間來鋪陳小說情節?而水域空間上所發生之事,對於小說進展是否有所影響?還是僅作爲交通作用而已?本文試圖針對以上問題,進行討論。此處所言的「水域空間」,乃指江河湖海,湖方面包含屬於觀光景點的西湖、太湖、洞庭湖等,但小說中若言及某村或某園林的井水或池水,本文暫不列入討論。另外,「船」在古典小說中的出現頻率甚高,載船者即是江河湖海,「船」的出現,往往也是小說情節轉折之處,職是之故,本文在此將行於水域空間上的「船」,一併列入討論。

明清時期爲話本小說出版量最爲豐碩的時期,本文擬擇「三言兩拍」、《型世言》、《歡喜冤家》、《人中畫》、《鼓掌絕塵》、《珍珠舶》、《雲仙笑》、《警寤鐘》、《生綃剪》、《連城璧》、《醉醒石》等部,6進行考察考察。論述進程則先說明水域空間在小說中的「正常功能」,擬分「旅遊」、「經商」、「任途」及「兩地往返」爲探討對象;接著,則是進一步探討在正常功能之外,小說家如何構設水域空間,以便鋪展小說情節,此處擬擇「避難」、「逢禍」、「藏匿他人」、「棄屍」、「偶遇」等現象爲討論範圍,並試圖解釋這些現象如何影響小說情節的推演。

2. 往返·經商·旅遊·任官:水域空間的「正常使用」

本文在此所謂的「正常使用」,指的是作爲交通工具的船舟,在行經水域空間過程中並沒有任何的意外發生,從而打亂原訂計畫或目的地。江河湖

⁵ 安作璋主編(2001)、《中國運河文化史》中冊、頁 1265。

⁶ 各小說版本請參照本文「徵引文獻」中所列,為求注解版面簡潔及行文方便,凡引小說情節或原文者,除方塊文外,不另行作注。明清話本存留至今者甚多,之所以選擇這幾部作品,是因為除了原先具有代表性之作外(如「三言兩拍」、《連城璧》),也可以關照較不為人知的作品(如《珍珠舶》、《雲仙笑》),期望能夠有較為允當的觀察。

海此類「水域空間」在古典小說中的正常使用,大約可見四種面向:「兩地往返」、「經商貿易」、「旅遊觀光」及「任途宦遊」。

(1) 兩地往返

江上行舟,游走於江河湖海此類「水域空間」上主要交通工具爲船,船隻的使用者則爲人,其作用乃是將某人或某物在甲地和乙地之間相互交通。小說在水域空間的正常使用最頻繁者,當是此類「兩地往返」的作用。明清時期的主要城市大多臨近運河旁,或是有河道環城流過,或是河道延伸入城中。因此,在縣城外,岸旁通常會搭設上下船的碼頭或驛站;抑或藉由水匣區隔,但仍能通過水匣航入城中河道,這在現今流傳地方志中所刊載的城市地圖,或以明清繁華城市爲背景的畫作中,可見其景(見附圖)。在古典小說中,常見某人居於城鎮之中,爲從甲地至乙地,即會「買船」、「雇船」或「喚個船工」,這大多數都在城外沿河岸畔的碼頭進行。

然在兩地往返的過程之中,多數小說僅用「不一日」即達某處,並不會 巨細靡遺地將船所行經的路線標示出來,如〈謝賓又洞庭遇故〉(《珍珠舶》 卷四第一回)中,謝賓又爲直隸蘇州府吳縣人氏,爲赴長沙太守賈賓之邀約, 即收拾行李,起身前往。小說寫道「一路經過之處,遇著名山勝境」,如此 「不一日」已到了湖廣長沙府。隨後,舟次洞庭湖,巧遇杜公亮,隨船到直 隸常州府吳錫,小說亦僅寫著「不一日已抵無錫」。由洞庭湖至無錫,讀者 尚可按圖索驥,沿長江,然後轉運河。7

同樣運用船隻水運兩地往返,《歡喜冤家》第十九回〈木知日真托妻寄子〉及第二十一回〈朱公子貪淫中毒計〉二則故事,對於在水域空間的行經路線,反而顯模糊。居於直隸徽州府休寧縣的木知日,以販生藥爲業,須到四川廣東購買藥材,小說寫著「木知日一去三月,到了廣東,收買各色藥材,將次又往四川去買」,而其僕人安僮行到川廣尋找木知日,也是「曉行夜住,

⁷ 水運空間的地圖路線,本文主要參考譚其驤主編(1992)《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七冊「元明時期」,頁 40-89。

宿水餐風」、「饑餐渴飲,戴月披星,走了幾時,方得到四川」;至於木知日貨物收齊,打點歸家時,正是暮秋天氣,回到家中已是隆冬之際,小說僅以「取路前進」概括。〈朱公子貪淫中毒計〉的故事地點則在浙江溫州府永嘉縣(小說誤寫成杭州府永嘉縣),伍星聽從妻子蓮姑建議,欲至杭州租屋,但因杭州乃省會所在,人才聚集,恐遇熟人,故搭船到同在杭州府的海寧縣賃下住房後,遂往溫州歸來,「不只一日到家」。隨後,伍星夫婦連同其弟伍雲,從溫州府永嘉至杭州府海寧避難,亦是雇得船隻,竟往海寧住下。在這二則故事中,不論兩地往返路線是否遙遠,但對於其中所經之地,則予以摒除,其中間或順水路而行,以船舟爲交通工具,但水域空間在此則成爲分隔兩地、往返須費數日的象徵,故從中可安插故事情節,或者留作日後避難的退路。

小說中也有針對水路路線描述較爲精細之作,如〈夢花生媚引鳳鸞交〉 (《歡喜冤家》第二十三回),該篇小說乃寫明正德年間,浙江紹興府山陰縣 人王國卿在前往南京納監途中,遇上詐騙的故事。小說中寫道王國卿擇訂三 月初三由山陰縣喚下一隻小船出發,一路向南而行。次早渡錢塘江,直到長 橋下船,後入西湖,「到了昭廣寺前上岸,過了聖堂橋,下了城河,船到了 新河壩」,隨後「雇了一隻大浪船,撐到新河壩北岸,把行李搬過了塘,一 齊下船,往北新關進發」,行到百家濱已晚,傍著鄰船而住,次早行船,直 到塘棲住船。至初八,船行至蘇州,逗留至十六日清晨開船,二十日方抵南 京。此條路線即是沿運河而行,後入長江,轉南京,時間點亦標示清楚;小 說中也提及「一路上,南來北往,咿咿啞啞,俱是船隻」,可見此條水路繁 忙之狀。前兩則故事同出《歡喜冤家》,但未若本則詳細,此或因作者西湖 漁隱主人嫺熟此路線之故。〈不亂坐懷終友托,力培正直抗權奸〉(《型世言》 第二十回)中,也可從小說裏頭畫出明顯的河運路線圖。小說敘述住在湖廣武 昌府嘉魚縣的監生秦鳳儀,欲至北京考試,從嘉魚出發,「討了一只船,自 長江而下」,不一日已到直隸揚州府,因將「正從臨清過」,故受友人石不磷 所托,攜一女子至臨清交給竇主事。行船一二日,至高郵湖夜宿,後「到長 淮,入清河,過呂梁洪,向匣河」,途中已過數日,方抵臨清。清河位於南

京淮安府、呂梁洪則處南京徐州府,乃順黃河河道而行;匣河當爲匣漕,在 元稱爲會通河,則是臨清至濟寧以南的一段運河。⁸

「兩地往返」在小說中還可見藉此運棺及嫁娶,前者如《型世言》第二回〈千金不易復仇,一死曲伸國法〉及第十八回〈撥淪落才王君擇婿,破兒女態季蘭成夫〉;後者如《醒世恆言》第七卷〈錢秀才錯占鳳凰儔〉,詳盡地描寫藉由水路提親、迎親的經過,以及在整個過程中有可能面臨的氣候問題。運棺及嫁娶是人生要事之一,雖然明清話本中記載藉由水路運棺及嫁娶的例子爲數不多,但反而最能顯現水路交通的便利性。

(2) 經商貿易

中國自古重農輕商、崇本抑末,但自明中葉起,商人地位逐漸抬頭,中國也走入商品經濟的時代,消費風氣鼎盛。明中葉以後,中國商業發達的原因大概有科舉之路壅塞、白銀大量湧入、手工業技術精進、國際貿易盛行等因素;另一方面,河道暢通、運河便捷,也是造就沿河道城市興起的重要推手,蓋因「由於河道暢通,對外物資交流十分方便,使商品生產與商品流通融爲一體,形成了明清運河城鎮密度大、間距小的特色」,⁹而運河貨運以其成本低廉、勞動力密度小和方便快捷爲世人青睞,更可達到南北貨運、東中西部物流的效果。¹⁰明清時期商品經濟發達,邱紹雄針對此現象提出「商賈小說」的概念,並定義爲「以商人爲主人公、以商人經商求利活動爲主要表現內容的小說」,¹¹並從明清時期出版的文言小說及白話小說,大量挖掘與商賈有關的小說內容及篇目。

邱紹雄《中國商賈小說史》主要詳細介紹與商賈有關的小說作品,而趙 維平《明清小說與運河文化》基本上則是著重於「運河文化哺育了明清小說,

⁸ 白壽彝(1984),《中國交通史》,頁 173。

⁹ 陳璧顯主編(2001),《中國大運河史》,頁 461。

¹⁰ 趙維平(2007),《明清小說與運河文化》,頁 53-55。

¹¹ 邱紹雄(2004),〈序言〉,《中國商賈小說史》,頁 1,該書歷數唐朝至近代的商賈小說,並簡要地介紹各部或各篇商賈小說的內容。

明清小說光大了運河文化」¹²的觀點,本文此處則是著眼於小說對於「水域空間」運用的部分。水運發達造就沿岸商業城鎭興起,而明清話本中的故事背景,多數是設定在這些沿岸城市,居處其中的商賈欲道別家眷,出外經商貿易,也多是憑藉水路運行。但這並不代表在小說中,水域空間會因商賈大量使用而予以詳盡描述,如〈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喻世明言》第一卷),只見搭船的動作,前文所言〈木知日真托妻寄子〉亦是如此。而《珍珠舶》卷一第二回寫趙雲山及趙相二人出外經商,則是「過了自己的船,其往蘇州進發,按下不題」,之後再次出現全寫蔣雲如何勾引王氏及馮氏,而二趙再次現身二人,已是「到了湖廣省城,投入牙行」,關於二趙行走水域過程,僅用「一路無話」四字帶過。由上數例,可以看出:水域空間以船作爲象徵,而船僅是藉以載運貨物、經商貿易的交通工具,以及對陸上城市所發生的情節穿針引線,進行縫合,商賈小說對水域空間的正常使用,大抵如此。

但仍有商賈小說中的人物出外經商,卻沒有清楚交代藉由何種交通工具進行貿易,如〈悍婦計去孀估,孝子生還老母〉(《型世言》第三回),對於周于倫的經商描述,僅是「起身」或出外經商數月歸回之類的語詞。但將象徵水域空間的「船」隱去不寫,畢竟屬於少例,有些作品則爲在地經商,未曾出外貿易,故無水域空間或船隻出現的必要。描述稍微精細者,則會將行經路線標示出來,如〈濟窮途俠士捐金,重報施賢紳取義〉(《醉醒石》第十回),浦肫夫欲至常州從商,行經吳江、五龍港、閶門等處。而《人中畫·狹路逢》第一回則寫湖廣辰州府商人李天造父子,自湖南買桐油,欲至蕪湖發賣,並將載貨大船,遣家人李貴押了先行,父子隨後趕上,小說還運用韻文筆墨描繪因忽然逆風泊船的小港之景,並行至岸邊烏江項王廟參拜,隨後還於江上逢水難。此回故事比較寫實地陳述出商賈忙苦的趕船生活,並且還需江上氣候的配合,否則有一定風險性存在,〈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顯靈〉(《二刻拍案驚奇》第三十七卷)中的一厄,即有因氣候不佳而造成的

¹² 趙維平(2007),《明清小說與運河文化》,頁7。

水難。¹³《歡喜冤家》第三回〈李月仙割愛救親夫〉及第七回〈陳之美巧計騙多嬌〉中,不論王文甫居住浙江,搭船至川廣販賣藥材,或是陳之美夥同潘璘雇船至瓜州買賣棉花,因水域空間在此將起「逢禍」作用,故作者特意描寫一段可使讀者清楚感受到商人乘舟、舟行川上、順風水急的圖像,但未若《人中書・狹路逢》這類將水域空間或船貫穿整篇小說,來得精細。¹⁴

有關於海外經商的作品並不多,〈轉運漢遇巧洞庭紅,波斯胡指破鼉龍 殼〉(《拍案驚奇》卷之一)則屬一例。蘇州府長洲縣閶門的「倒運漢」文若虚,與友人走海販貨,行至吉零國,意外將「洞庭紅」售得好價;起程回國途中,遇著海上氣候不佳,船隻漂至一島,文若虛於此處將「床大一個敗龜殼」,攜至福建,一位來自波斯的商人指出此爲鼉龍殼,以高價購之。又如〈遭風遇盜致奇贏,讓本還財成巨富〉(《連城璧》卷六)中廣東商人秦世芳曾乘船順風飄到朝鮮,並「有行家招接上岸,替他尋人發賣」。吉零國,即今位於緬甸東南沿海的德林達伊省(Tanintharyi),15朝鮮即今之韓國,文若虛

¹³ 明清時期商業發達,爲應付交通路線問題,此時有商人編纂路程圖並出版,以供他人便利。迄今流傳下來的商書並不多,較爲知名者如黃汴《一統路程圖記》(又名《新刻水陸路程便覽》)、程春宇《士商類要》,此二部商書對於水陸路程皆有詳盡記載,甚至寫入行程風險、名勝古蹟等商旅須知,這在小說中也多少反映出來。商賈小說部分路程描述精緻之作,也可視爲擁有此類商書的作用,宋莉華(2004)《明清時期的小說傳播》中提及明清時期的商人亦爲小說閱讀者及傳播者(頁 26-28),對小說中所出現的水域空間應當熟悉,也有可能產生共鳴,甚至產生旅遊或是注意路途是否有風險的功能。關於黃汴《一統路程圖記》及程春宇《士商類要》的介紹,可參見楊正泰(2006),《明代驛站考(增訂本)》中收錄對二書所撰的前言(頁 197-198 及 295-296)。

¹⁴ 無論商賈小說中對於水域空間描述精細粗糙,皆可表達出商業繁忙盛景,尤其是江南地區, 宋莉華(2004)《明清時期的小說傳播》在分析明清時期小說傳播時,提及「商業市鎮的發展 與便利的交通推動文化的繁榮」,並說道「江南水鄉河漢縱橫,有長江、太湖、運河三大水 系,市鎮間的閒距很多,平均在九至三十里之間,舟楫隨處可達。從明代黃汴《新刻水陸 路程便覽》(隆慶四年 1570)、程春宇《士商類要》(天啓六年 1626)等商書中有關江南水運系 統的記載可知,江南水網密佈,尤其是蘇松杭嘉湖這些經濟發達地區,水運更是發達」(頁 22-23),在小說中即經常以蘇松杭嘉湖等處爲背景。

¹⁵ 清·張廷玉等敕修(1987)《明史》卷三百二十五〈外國六〉有載「巴喇西,去中國絕遠。正 德六年,遣使臣沙地白入貢,言其國在南海,始奉王命來朝,舟行四年半,遭風飄至西瀾 海,舟壞,止存一小艇,又漂流八日,至得吉零國,居一年」(頁 8429-8430),是《明史》

及秦世芳搭船出海行商的例子雖在話本中並不多,但一定程度上反映明中葉 以後的海線貿易,論者以爲此表明中國國內的商業資本活動已經開始突破封 建統治的束縛而走向國際市場,並從傳統「朝貢」關係的貿易轉向國際關係 貿易,不再是爲了顯耀皇威。¹⁶但此種朝貢制度,乃是假進貢之名,行高價 兜售貨物予皇帝之實,增加國庫負擔,自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遂詔命嚴禁 私下諸番互市、惟琉球、真臘、暹羅許入貢,至宣宗宣德以後,入貢諸國大 多已不守貢制,後來更演變成附隨貢舶而來的番貨,朝廷爲了財政收入,從 免予課稅變成抽分制度;另外,厲行海禁的結果,則使東南濱海居民,私自 下海貿易,甚且勾結夷寇犯邊爲患,¹⁷據學者考證「嘉靖時所謂『倭亂』完 全是明朝政權實行嚴厲『海禁』政策」所引起的,直至降慶初年開始取消海 禁,到了萬曆以後,中國私人海上貿易進入新的展階段,從而造就明末清初 私人海上貿易的繁榮與發展。18前文所言文若虛及秦世芳之事,前者發生於 「國朝成化年間」,後者則在「弘治年間」,皆爲海禁之時,故所謂「從傳統 『朝貢』關係的貿易轉向國際關係貿易」,究竟是沿海居民的私人海航貿易, 並非獲得官方許可,日選擇在隱密性良好日官府鞭長草及的港口進行走私貿 易?抑或是在官府開放並控制下的港口,入港泊船及出港漂洋,行合法交 易?可惜在小說中模糊其事,未能明白透視。

(3) 旅遊觀光

「江河湖海」除了經商貿易外,另一用途則是「旅遊觀光」。王文進曾 以《文選》爲例,討論南朝「山水詩」中「遊覽」與「行旅」的區分,指出 《文選》將赴任新職或告假之作一律歸入「行旅」,觀其所錄詩作「一方面

中唯一一條提到「吉零國」的資料。根據清·丁謙(1972)在《明史外國傳地理考證》中的考證,其巴刺西即波斯、西瀾即印度南錫蘭島、得吉零國即緬甸東南海濱地那悉林部(頁 16b-17a)。其「地那悉林」即 Tenasserim(丹那沙林),後改名為 Tanintharyi(德林達伊)。

¹⁶ 唐琰(2008),〈明清小說視野中的海洋發展〉,《明清小說研究》第3期,頁34。

¹⁷ 魯傳鼎(1985),《中國貿易史》,頁 38-39、頁 42。

¹⁸ 林仁川(1987),《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頁72、頁84。

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三卷第二期

是以『懷鄉』爲底色,一方面則又奔濺著驚流急湍,形成一種既低沈又快捷的節奏」,而「遊覽的『遊』是主動的,是安頓後的生命向外怡然伸展」,文中亦明言二者之性質並非涇渭分明,難免會有交疊及遺漏之處,但宏觀看來,卻各有其獨特屬性。¹⁹本文在此所指的「旅遊觀光」,偏向王文進所言「遊覽」。

「旅遊」一詞最早可見於齊梁時沈約《悲哉行》詩句「旅遊媚年春,年春媚遊人」,從章必功所著《中國旅遊史》²⁰一書,可發現「旅遊」在中國文史典籍中,一直是個時時可見的活動。章氏經由經史子集等書中,搜索古人旅遊行蹤,並試圖勾勒出歷代別具特色的旅遊史,屬於綜論之作,故對於古人在水域空間的旅行方式,無法進行細緻描寫。周振鶴指出明人文集中關於遊記的作品,正德以前甚少,嘉靖年間明顯增多,至萬曆及天啓、崇禎間則甚爲普遍。²¹龔鵬程在「晚明小品,遊記或與遊相關者佔了大宗」的事實之上,予以歷史性的討論,可知晚明時期的遠遊意識如何逆轉了鄉居安土的傳統,而「遊道」之建立,既確立了遊的價值,也開啓了探索世界的新傳統,²²可使讀者明白晚明以後的文人對於「遊」的接受情況。巫仁恕曾以「旅遊文化」爲例,探討晚明士大夫如何塑造消費的「品味」?又如何用來區分身分?甚至還出現將各地著名旅遊勝地由古至今相關的遊記與旅遊詩總集成冊的書。巫文認爲從士大夫的「遊記」文體來看,最能稱得上值得「遊」的不外是名山、大湖與園林三大類,但巫文重點乃在十大夫及文人如何藉由「旅遊」

¹⁹ 王文進(1997),〈南朝「山水詩」中「遊覽」與「行旅」的區分——以《文選》爲主的觀察〉, 《東華人文學報》第1期,頁108、頁112。

²⁰ 章必功(1992)。

²¹ 周振鶴(2005)、〈從明人文集看晚明旅遊風氣及其與地理學的關係〉、《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1期,頁73。

²² 龔鵬程(1996),〈遊人記遊:論晚明小品遊記〉,《中華學苑》第48期,頁39、頁56。龔鵬程於文中雖提出了若把明末遊記小品相對於「鄉居安土」傳統來看,其「『山水遊旅』正是『歸田園居』的另一端,所表現的,乃是不安土重遷、不以田園爲價值的歸嚮」(頁42),但何以有此轉變,並未予以說明,這應當與晚明以後,消費能力提升、儒商身份混合、文人充當官商旅遊的幫襯等現象有關。

凸顯其消費品味,故對於遊何名山、覽何大湖、賞何園林,並無深入介紹,然從文中所引之例,可知晚明的舟遊現象是相當普遍的。²³關於明人的舟遊生活,也已有學者著書專門探討,²⁴相較于運用車、馬、輿等三類交通工具行遊,舟遊也可說是明人最常紀錄的一種旅遊方式,這大概是因爲「對陸運而言,無論是以人力或獸力的形式移動,皆相當的耗費勞力而且效率較低,因此利用天然力運行的舟船,即成爲賈人轉載行旅時最佳選擇」,亦即具有省時省力的優點。²⁵

明人文集中,因舟遊而撰之文頗多,但在話本小說之中,很少見到純粹的舟遊生活,多數屬於在兩地往返之時所行經的名山勝景以及在舟中的享樂景象。這些名山勝景,小說作者不全然願意花費筆墨描述勾勒,如前文所提及欲至湖廣長沙的謝賓又,小說只寫道「一路經過之處,遇著名山勝境,俱有題味,不及備記」;但在這則小說中,還可看見洞庭湖非但作爲船旅必經之地,同時也是一個旅遊景點,小說透過謝賓又之眼,描述船泊於浦口之夜乃月色澄清,風恬浪息,可遙望七十二峰,黛色連天,浩浩茫茫,碧波萬頃;至於船上的遊樂狀況,則如杜功亮援琴消遣,杜、謝二人更是暖酒對酌,聯吟一律。其餘如〈杜十娘怒沈百寶箱〉(《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的李甲與杜十娘雇船同至浙江嘉興府途中,在仲冬中旬、夜明如水之夜,杜十娘「開喉頓嗓,取扇按拍,嗚嗚咽咽,歌出元人施君美拜月亭雜劇上『狀元執盞與嬋娟』一曲,名爲小桃紅」;《型世言》第二十一回當中,石不磷及秦鳳儀二人則是在縱酒狂歌之中,搭船穿過洞庭湖;《鼓掌絕塵》第三十八回,則寫張秀與妻小行船至浙江桐盧地界時,正巧爲八月十五中秋夜,並在船中玩賞

²³ 巫仁恕(2008),《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第四章〈消費品味與身分區別—— 以旅遊文化爲例〉,頁 177-213。

²⁴ 相關議題可見林利隆(2005)《明人的舟遊生活:南方文人水上生活文化的開展》,該書就舟遊生活當中的背景、主人、場域、功能、類型、載具等六個面向,詳盡剖析明代南方文人在水上生活文化的狀況。

²⁵ 張嘉昕(2004),《明人的旅遊生活》,頁 84。

多時,甚至於泊船上岸,瀏覽嚴子陵的釣臺及子陵墓;²⁶《珍珠舶》卷一第二回寫趙雲山設宴白龍潭船內,要與趙相解悶的情景:「來到船中,早飯已備。飯後把那象棋,略略消遣了幾局。時未過午,將酒飲起,直至黃昏始散。」以上幾篇小說簡繪聯吟、弈棋、侑酒、歌唱、登岸攬勝等逸樂之狀,皆爲舟遊常見活動。《鼓掌絕塵》第十五回則描述端午節時,卞京城外的鳳坡湖裡大作龍舟競會,而鳳坡湖本身亦是人肩雜沓、來往紛紛的觀光景點,甚至畫舫亦會遊覽斯處,小說裡頭即點出婁公子畫舫中的情景乃是「船艙裡擺列著三張酒席,坐著三個整齊後生,兩旁坐著兩個妓女」,此與袁宏道「千金買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數人,遊閑數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將至」²⁷的挾妓伴遊之景,可相互參照。²⁸

然而,小說中所出現的水域空間,遊覽人次最多者,當屬西湖,如《人中畫·寒徹骨》中的柳春蔭,雖搭舡至西湖,但小說中對西湖景致亦並無特殊描繪,僅言柳春蔭「在西湖上租了一個幽僻寓處住下,終日瀏覽那西湖六橋之勝」。相較之下,《鼓掌絕塵》第十三回的描述較爲詳盡,夏虎行至杭州趁機遊覽西湖,作者即以一段韻文描繪西湖中的名山勝景,並透過夏虎移步換景,將西湖名勝攬入其中,表現出遊覽閒適之情。《歡喜冤家》第十五回及第二十三回,也分別藉由馬玉貞、周全及王國卿之眼,以詩詞讚嘆西湖美景。若沿著運河再往上遊行,則可至蘇州的太湖、虎丘及閶門遊覽,如〈唐解元一笑姻緣〉(《警世通言》第二十六卷)即以閶門的舟遊活動爲開頭;《歡

查 由徽州府至杭州府的水路中,嚴子陵的釣臺及子陵墓,爲一重要景點,《一統路程圖記》(收入楊正泰《明代驛站考(增訂本)》附錄二)卷七〈江南水路〉三七「休寧縣至杭州府水路」(頁278),及《士商類要》(收入楊正泰《明代驛站考(增訂本)》附錄二)卷之一「徽州府由嚴州至杭州水路程」(頁312)皆有記載。

²⁷ 明·袁宏道(1976),《袁中郎全集二》,頁 922。

²⁸ 明中葉後,文人士大夫常挾妓伴遊,至明末,此種風氣更行普遍,從律法節制到邀妓成風的變化,趙軼峰認爲除了明朝典制漸趨弱化之外,還與明中葉以後士大夫本身的嬗變有關。以上說法詳見趙軼峰(2001),〈晚明士子和妓女的交往與儒家傳統〉,《中國史研究》第4期,頁 143-156。關於明清間妓女與文人的互動,還可參見王鴻泰(1999),〈青樓名妓與情藝生活〉,頁 73-123,文中對於妓女如何步入「文人化」的過程,以及士人如何與名妓互動以達「情藝生活」,皆有細緻的分析。

喜冤家》第二十三回描述王國卿前往南京納監途中,則曾在蘇州盤旋數日, 打算十五夜上虎丘賞月,而《珍珠舶》卷二第一回中則寫金集之與朋友渡江 至蘇,遊賞虎丘,更「泛舟直至武林,把那六橋楊柳,三竺煙霞,到處遊了 一遍」;太湖之景描述最爲詳盡者,則爲〈錢秀才錯占鳳凰儔〉(《醒世恆言》 第七卷),簡明介紹其地理方位及湖光山色。

就文化地理學而言,明清小說家們將這些地理景觀結合人文文化,並記錄下該時代的痕跡,這些痕跡累積至現當代的讀者眼前,形成一種「歷史重寫本」(palimpsest),²⁹因爲有人的涉入,這些地理景觀被不斷地書寫記載,新舊的地理景觀和人文文化混合在一起,然後藉由詩文集、小說出版或戲曲演出等「文化傳播」方式,逐漸形成商品化或者消費化的空間,供讀者閱讀或是親至瀏覽。前文所論及的諸篇小說即可看出此種「歷史重寫本」的作用,由新的時代之人,將舊的地理風景名人逸事、古蹟勝景寫入小說之中,二者混雜在一起,爲地理注入新生命,如《西湖二集》及《西湖佳話》乃爲詳盡觀察文化地理學中的「歷史重寫本」現象最佳範本。

(4) 仕途宦遊

中國幅原遼闊,官員若欲遷任他方,也是需要藉由舟川之助,如《人中畫·終有報》第四回〈被窩中識破假貨,公堂上審出眞情〉中,居於直隸蘇州府長州縣的元主事,升遷福建邵武府,小說只寫「元主事就起身上任,元晏直送父親上舡」;而《歡喜冤家》第四回〈香菜根喬妝奸命婦〉中的張英,差往陝西巡按,上任途中,亦是乘船,但先往揚州娶一夫人,並與此夫人在船中成親,後攜回原籍江西南昌府豐城縣,以掌偌大家業;前文所言的秦鳳儀,入京試畢,授廣西柳州府融縣縣丞,上任亦是行走水道,經揚州,過湖

²⁹ 所謂「歷史重寫本」(palimpsest),(英)邁克·克朗(2005)在《文化地理學》中解釋:「『palimpsest』一詞源自中世紀書寫用的印模,原先刻在印模上的文字可以擦去,然後在上面一次次地重新刻寫文字。其實以前刻上的文字從未徹底擦掉,於是隨著時間的流逝,新、舊文字就混合在一起:重寫本反映了所有被擦除及再次書寫上去的總數。......一個地區的文化表明該地區的景觀是所有隨時間消逝增長、變異及重複的文化的總和或集中體現。」(頁 20)

廣洞庭,至湖廣長沙府湘潭,「那邊也打發幾個人,一隻船來迎接」。

在幾篇運用水路上任的小說當中,以〈孔良宗負義薄東翁〉(《歡喜冤家》第十七回)寫江五常由浙江秀水縣至福建擔任巡撫御使的路程較爲詳細。首先,親友餞于西水驛,隨掌號開船,由「三十名縴夫,把那坐船似行雲流水一般,風也似快,登時拉到陸門」,約莫二更時分,船已到皀林,未到天明,已過崇德,之後再添十名縴夫船索,一扯到杭州,後過塘西,「未到申刻,船已到關」。入關後,船榜於碼頭,上轎穿城而過,至浙江驛起夫進發,未及一月,到了隔界,官員人役湧來迎接。這段描寫已將明代驛站制度簡約納入,小說中所提及的西水驛、皀林、浙江驛都是城外臨近江河旁的驛站,如「西水驛屬府,在通越門外,縣西南三里」,30而通越門則爲秀水縣的西城門。31在明代驛站制度中有言「文武官員到任一千五百里之外」,按規定可使用驛站資源;至於「到關」,則是憑藉著「符驗」爲關文在當地驛站起關水路交通工具,但在明中葉以後,起關驛傳船馬改用「勘合」,32本篇小說因未載明時間,故不知所用爲何。

此種「仕途」,逐漸產生「宦遊」的模式。所謂「宦遊」,乃意味著因官務責任而出遊,是一種被動指派他地任官的行遊活動。³³王國瓔曾以山水詩為例,認爲與宦遊生涯共詠的山水詩在兩晉時已出現,直至謝朓筆下才壯大聲勢;到了唐朝,科舉選拔人才制度爲寒門庶族大開進士之門,不論入仕前或入仕後,提供了更多體認宦遊生涯的經驗,也增加行旅漫遊、飽覽山水的機會,從中產生許多與宦遊生涯共詠的山水詩篇;直至宋代,過去南朝及唐代在宦遊生涯中經常感慨的離鄉之悲、思歸之嘆,已變而爲一分「惆悵」,又藉著異鄉山水「似吾鄉」,流露出不妨趁此盡興觀賞的豁達心境。³⁴王國瓔所考察宦遊生涯與山水詩之關係,已是稍微勾勒出從兩晉到宋,中國文人對

³⁰ 明・李培等修,黃洪憲等纂(1970),《浙江省秀水縣志》,卷之二〈建置志・驛遞〉,頁 113。

³¹ 明·李培等修,黃洪憲等纂(1970),《浙江省秀水縣志》,卷之一〈輿地志·城池〉,頁 26。

³² 蘇同炳(1969),《明代驛站制度》,頁 46-47、頁 351-365、頁 373。

³³ 吳毓琪(2006),《康熙時期台灣宦遊詩之研究》,頁 10。

³⁴ 王國瓔(1986),《中國山水詩研究》,頁 179、頁 198-199、頁 313。

於「宦遊」觀念的轉變。巫仁恕認爲「宦遊四方」在中國早已有之,「但是 到了晚明,『宦游』的意義漸漸轉向休閒旅遊」,而「官員在『無訟事』的時 候就是他們旅遊的時機」。³⁵此類作品可舉明人王士性爲例,王士性曾任官多 處,且甚喜遊歷,並紀錄各地山川名勝、關塞險要、風俗物產等,寫成《廣 志繹》36一書,成爲一部頗具史料價值的書籍。古典小說中也有不少在仕途 過程的遊山玩水之作,如《人中書‧寒徹骨》的商尚書「因起官進京,打從 西湖上過,爲愛湖上風景,就流連了半月。這夜但見明月如畫,兩堤上山色 湖光十分可愛,因住舡斷橋,帶了兩個家人。沿長堤一帶,步月當玩」,而 其船中,則是「只見許多家人林立,船上錦屛玉案,銀燭輝煌,擺設得甚是 富麗。」但此類小說中,水域空間及船舟,成了必須經過的路線及使用到的 交通工具,主要是表現「輕舟已過萬重山」的任途,對於山水景色,很難如 同王十性《廣志繹》中所描摩得如此精細。小說作者藉由人物宦遊,有時還 會意外紀錄一地的風俗,如《鼓掌絕塵》第三十九回中,楊太守在前往廣西 就任,途經黃泥嶺,居於白雲寺中,欲尋「消遣的所在」,寺中住持建議由 「本寺後面,隨水路過西,轉彎駱北,不上一里路,有座三義廟。明日五月 十三,是三界伏魔大帝關聖降生之辰,合鄉居民都來慶壽」,楊太守前往觀 戲,小說也鉅細靡遺地載錄其演戲過程。

另外,尚有趁著公務閒暇時期,搭舟乘船至他處遊覽的宦遊,此例可見 於〈馬玉貞汲水遇情郎〉(《歡喜冤家》第十五回),周全至都堂下了公文,

³⁵ 巫仁恕(2008),《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第四章〈消費品味與身分區別—— 以旅遊文化爲例〉,頁 181-182。

³⁶ 明·王士性撰,呂景琳校點(1997)。關於王士性及其《廣志繹》一書,譚其驤〈積極發展歷史人文地理研究〉(1991),提及:在明末清初百年內,是很受重視的,但由於乾嘉考據學興起後,地理專講建置沿革,而五四以後地理界又流行重自然輕人文的風氣,故徐霞客受到丁文江以來廣大地理學者的尊崇,王士性及其《廣志繹》逐漸不爲人所知。(頁 31)後來周振鶴(1993)出版《王士性地理書三種》,整理點校王士性《五嶽遊草》、《廣遊志》、《廣志繹》,集結成書,王士性其人其書逐受重視,大陸方面已累積不少研究成果,台灣則可見龔鵬程(1996)〈遊人記遊:論晚明小品遊記〉略有論述,近期則有范宜如(2007)、〈華夏邊緣的觀察視域:王士性《廣志繹》的異文化敘述與地理想像〉、《國文學報》第42期,頁121-151。

未及領文,則乘船至西湖一遊,而〈孔良宗負義薄東翁〉(《歡喜冤家》第十七回)中,住在浙江嘉興府秀水縣的官宦江五常即是憑運河之便,「帶了幾個家人,兩個小使,動用之物,無所不有」,特至西湖一遊。以上二例,頗符巫仁恕所言「官員在『無訟事』的時候就是他們旅遊的時機」。

上文透過兩地往返、經商貿易、旅遊觀光及任途宦遊四部分,來探討明 清話本中關於水域空間的正常使用,此處可援引敘事學中論及空間相關理 論,分析其運用狀況。米克・巴爾(Mieke Bal)將城市或河流可以在地理地圖 上標出者,稱之爲「地點」,人物透過視覺、聽覺、觸覺去感知地點並將此 描述出來,則形成「空間」。空間的填充由那一空間所找到的物體所決定, 在空間中,一個或多個物體有時會被詳細描述,但在另一些故事中,空間會 以一種含混不明的方式描述出來。就明清話本中對於水域空間的正常使用而 言,雖然可見部分作品試圖以該空間所應有的物品予以塡充,但更常見的是 水域空間被「以一種含混不明的方式描述出來」,尤其常藉由「船」來象徵 整個「水域空間」時,此含混不明的現象更爲明顯,這就如同米克・巴爾所 認為的「結構空間」:空間它只是一個結構,一個行動的地點。除了「結構 空間」之外,空間也常被「主題化」,亦即空間自身成爲描述的對象本身, 如此一來,空間成爲一個「行動著的地點」,而非「行爲的地點」,米克・巴 爾稱之爲「主題化空間」,這在明清話本水域空間的正常使用方面,主要凸 顯在遊覽觀光及任途宦遊方面。而在以上「結構空間」及「主題化空間」的 節疇中,米克,巴爾提出於故事中將會產生「靜態作用」及「動態作用」。 靜態作用的空間是一個主題化或非主題化的固定結構,事件在其中發生。動 態作用的空間則是一個容許人物行動的要素,如人物行走,因而需要一條道 路;若是旅行,則需要如鄉村、海洋、天空之類的大空間。關於靜態空間的 作用,將於下節討論到水域空間上所發生的事件如何影響小說情節時,可以 看得更爲清楚;至於動態空間的作用,無論兩地往返、經商貿易或任途宦遊, 皆是人物在行動,舟行於上的水域即屬於一大空間。37

³⁷ 米克·巴爾述及「空間」的觀點,請詳參(荷蘭)米克·巴爾著、譚君強譯(2005),《敘述學: 敘事理論導論(第二版)》,頁 156-167。

胡亞敏則將空間稱之爲「環境」,細分出自然現象、社會背景及物質產品三類;至於環境的呈現方式,則標示出「支配與從屬」、「清晰與模糊」及「靜態與動態」三種。胡亞敏解釋「從屬式環境」蓋因故事側重情節的發展,突出人物的活動,而自然環境、物質產品只稍帶幾筆,並舉中國早期說書藝術爲例,爲了迎合聽眾心理,故多用「從屬式環境」,說書人往往僅用詩詞簡單交代故事發生背景,而這點正可以解釋何以在小說中常用「船」來代替「水域空間」,蓋因陸地上所衍生的情節,往往較爲吸引讀者,而水域空間中的自然環境、物質產品則僅是「從屬性環境」。對於動態環境及靜態環境,則與米克・巴爾所言相去無幾,其中關於動態環境,胡亞敏解釋最顯而易見的是故事中地點的變化,人物從一個地方轉向另一個地方,並認爲以主人公的遊歷爲線索的小說中的環境,是動態環境的典型形式。38若就以上諸例的分析看來,小說作者乃是使用「水域空間」及「船舟」將小說人物的遊歷串連起來,即表現出動態環境。

另外,有些作者對於某些水域空間描寫精細,可見對該空間的嫻熟程度,「地域空間的選擇必然受到兩種情況的制約:一是作者本身的生活經歷;一是作品材料的客觀內容」,而「小說家只能寫自己瞭解的、熟悉的事物,這對地域空間的選擇也同樣。或者是出於熟知,或者是出於偏愛,許多小說家都有個自己最得心應手的地域空間。」³⁹從上文所舉的作品看來,多數話本作者較爲熟悉的場景,當爲蘇、杭一帶,故對此處的水域空間及水路路線,著墨甚多,同時也印證蘇、杭一代的城市榮景。

3. 載舟/覆舟:作爲「鋪陳情節使用」的水域空間

從上文所列舉有關水域空間的正常使用中,可反映人民在社會生活及貿 易經濟等方面,相當仰賴水域空間所帶來的便利性。但水域空間的正常使

³⁸ 關於胡亞敏對於「環境」的看法,請詳參胡亞敏(2004),《敘事學》,頁 158-168。

³⁹ 金健人(1988),《小說結構美學》,頁 62-63。

用,實際上並未干涉到小說後續情節發展,然「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水域空間雖擁有極大的交通性及便利性,就另一面而言,恐怕也將招致變異性及毀滅性。本節即就其載舟/覆舟的雙面刃特質,看待小說作者如何藉此鋪陳情節。這裏所謂「鋪陳情節使用」,指的是小說中所構設與水域空間相關聯的情節或場景,對小說後續發展產生巨大的變動及影響,亦即是小說家有意地安排,若脫除此情節或場景,小說即失去發展的能動性。本節擬列出「逢禍」、「避難」、「匿藏他人、埋跡及棄屍」、「自殺」、「偶遇」等五項,以茲爲例。

(1) 逢禍

清人王應奎曾載「明時錢塘江有航船舟子最橫,每至波濤險處,則謂一舟性命死生盡在吾手,輒索財物不已」,後為浙江按察使制服的故事;⁴⁰明人程春宇《士商類要》中則有一篇〈船腳總論〉,藉以告誠提醒雇船、乘船時需防範船腳奸詐偷盜之事。⁴¹在明清話本中,也可見此類蠻橫惡行的舟子船腳,如〈顧阿秀喜捨檀那物,崔俊臣巧會芙蓉屛〉(《初刻拍案驚奇卷》二十七)寫崔俊臣攜妻子王氏赴永嘉縣上任,行船途中遭船家行劫,致使二人分離,小說此後則轉寫二人如何藉由芙蓉屛重逢。「遇盜」之事卻可見數例,如前文提及的秦鳳儀,行經水道就任途中,作者安排一段船上遇盜的情節,盜賊爲廣西熟苗,每年春夏之交出來劫掠,在石不磷挺身制敵後,秦鳳儀表現出「這些人盡有追於饑寒,不得已爲盜」的仁人風範,而此舉也使得秦鳳儀任融縣縣丞,至熟苗峒中催糧時,巧遇此盜,順利納糧。同樣在船上遇盜的還可見於〈費人龍避難逢豪惡〉(《歡喜冤家》第十六回)費人龍爲避難,由浙江湖州府德清縣喚只浪船出發往東,船先搖至塘西住下,次早又到崇德交界;但避難反成逢難,最後又是乘船從崇德返回德清。費人龍在雇船北上赴京趕考途中,船行到崇德,過去石門地方,夫妻們正在此處吃酒,船離岸

⁴⁰ 清·王應奎撰,王彬、嚴英俊點校(1997),《柳南隨筆》,卷一,頁 14。

⁴¹ 明·程春宇(2006),《士商類要》,卷之二〈船腳總論〉,頁 358-359。

有三尺,只聽得船頭上一聲響,船側了幾下,費人龍出艙一看,是一大漢,此人是江洋大盜「水裏龍」王立。費人龍以酒相待,而水裏龍得知費人龍遭遇後,不搶其財,反「忙取紙筆劃了一條青龍在水盤旋之勢」,貼於船頭,助其水路平安。此段情節後使費人龍審察揚子江殺人事件時,與水裏龍相遇,並釋放之。〈遭風遇盜致奇贏,讓本還財成巨富〉(《連城壁》卷六)的秦世良向楊百萬借債五百兩,買了綢緞,欲飄洋經商,卻途遇強盜劫貨,小說作者李漁藉此道出強盜劫貨至朝鮮發賣,並被招爲駙馬,最後與秦世芳相遇,並託環陳帳的結局。

以上三則在船上遇盜之事,前二則用以彰顯仁德之心必有福報的思維,後一則雖言「相法」,但實則讚揚輕財重義之人。除了船上遇盜,還可見在船上遭人殺害,如《歡喜冤家》第三回〈李月仙割愛救親夫〉及第七回〈陳之美巧計騙多嬌〉、《生綃剪》第十八回〈疾醜生貪姿害友,韓珠兒深智殉仇〉;亦可見遭逢水厄,如《鼓掌絕塵》第三十七回、《珍珠舶》卷三及《人中畫·狹路逢》。在〈陳之美巧計騙多嬌〉中,住在直隸徐州的陳之美與潘璘同至瓜州買棉花,陳因垂涎潘妻姿色,二人歸途經過西關渡口時,陳之美設計潘璘落水致死:

回至西關渡口,是個深水所在,幽僻去處,往來者稀,璘上渡以篙撐船,彩對(忖)曰:『此處可以下手。』哄船家曰:『把酒與我一暖,與潘舍同吃。』船家到火艙襄取火,陳彩走上船頭道:『你可到艙中吃酒,待我撐罷。』潘璘那篙子,被陳彩來取,潘璘放手,陳彩一推,跌在深淵裏,潘璘竄上水面,陳彩一篙打了下去,方叫船户救人。梢公來時,人已浸死矣。倩漁翁打撈屍首,就將錢買托漁翁,以火燒屍。焚過,裹了骨髓。42

無獨有偶,《生綃剪》第十八回〈疾醜生貪姿害友,韓珠兒深智殉仇〉亦有

⁴² 明·西湖漁隱主人(1994),《歡喜冤家》,第七回〈陳之美巧計騙多嬌〉,頁 299-300。

此橋段。以上二則故事,因其夫遭逢水厄,妻子爲繼續扶持夫家家計,故在情非得已且不知情下,下嫁兇手,甚至已有子嗣,但因偶然機會,得知殺夫兇手爲何人後,則又不顧一切、甘心放下早已獲得的富貴生活,報官舉發或私下報仇。⁴³作者有意安排丈夫逢水厄的橋段,主要是爲了鋪陳兇手如何將美嬌娘取到手、而美嬌娘又如何爲夫報仇的情節。〈李月仙割愛救親夫〉中,亦是有此類似情節,住在浙江湖州府安吉州山中的王文甫,欲攜章必英同至廣東賣藥材,二人同搭一船,章必英趁王文甫在船頭出恭時,因欲與月英做個長久夫妻,雙手把文甫推落水中。但王文甫命不該絕,恰巧扯上一株大柳樹,扒到岸上,投告縣官。該則故事在王文甫水難後,表現李月仙如何割其所愛(章必英),救其親夫,其中雖可見數段性愛描寫,但除了中間插入文甫告官抓人、必英買官構陷外,運用船上殺人的用意及其後所衍生的情節,與前二則可相呼應。

同樣如同王文甫順水路經商,《人中畫·狹路逢》中,湖廣辰州府商人李天造及其子李春榮,乘船趕到蕪湖,行至烏江,卻遭逢水厄,沖散父子二人,最後又是一場水厄,讓二人於烏江廟重逢。在此則故事中,表面上是說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但其實乃言神道不可誣。讀者可於該故事中清楚窺見古人的完整舟行生活,藉此行經各處(如歸家、經商、赴科考等),又可見有人欲跳江自殺,又可見小說作者如何安排江河及船舟,使父子經歷苦難離別之痛及忽然重逢之喜,並從中探索神道不可誣,以及宣揚雖遭厄難但若心存善念,終有福報的道德思維。

至如《鼓掌絕塵》第三十七回、《珍珠舶》卷三中的水厄場景,就沒有那樣好的運氣了。前者,陳珍打點船隻欲返金陵,「恰值七月二十三夜,坐船正泊在三浙江中,忽遇風潮大變」,一家數口溺死在錢塘江中。小說在此則設計張秀返回金陵時,陳珍托夢,求助超渡,巧妙地把超渡水魂道場的情

⁴³ 在明清話本中,此種爲夫報仇的故事,除本文所言二例之外,尚可見於《歡喜冤家》第三 回〈李月仙割愛救親夫〉及《石點頭》卷十二〈侯官縣烈女殲仇〉,此情節後來也可見於司 馬中原(2008)〈啖頭記〉,《冰窟窿》,頁 89-168。

節寫入其中。《珍珠舶》卷三的故事裏,船成了楊家長工阿喜與海棠戲狎的 工具,但亦使之命喪黃泉。小說借阿喜鬼魂訴說溺水經過:

說起好苦,我那日獨自搖船,怎奈風又逆、雨又大。剛剛過得石門鎮上,忽遇海神經過,一陣旋風,船竟覆沒。那海神又怪我沖犯節道,喝令左右將那鐵鞭撾了數十。以此雖諳水性,命付波臣。44

溺斃後的阿喜因「念家主厚恩,拋撇不下」,故依附顧茂生的糧船回到秀州。阿喜溺水情節牽扯出全卷小說的後續發展,如鬼告禍福、鄔法師收鬼、眾鬼鬧楊家,乃至楊敬山啓建道場、救濟孤魂等,皆因此事而來。45此二則小說皆可見神怪鬼異色彩充斥期間,後文亦將看見投水自溺者,也會以假神道,藉此報仇或破案。

綜上所述,江河湖海此類水域空間,作爲南來北返的重要交通路線,而 浮於水上的船舟,則爲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舉凡逢難之事於此發生,皆可 視爲合理之事;而且又不爲他人所知,亦爲最佳的犯罪場所,神道鬼怪之事, 也可從中生起。

(2) 避難

除了逢禍之外,藉由水路「避難」也小說中時常出現的場景,前文所提及的費人龍即是一例,只是該篇小說由避難而成逢禍,最後又營造出「是福是禍看官難料」之感。〈朱公子貪淫中毒計〉(《歡喜冤家》第二十一回)中的伍星夫婦,也是藉由水路避難。在古時陸路交通不發達的情況下,路線便利的水路交通,成爲如何避難的一大選擇。可以猜測此原因,乃是在於冤家若

⁴⁴ 清·鴛湖煙水散人著,丁炳麟校點(1993),《珍珠舶》,卷三第一回〈石門鎮鬼附活人船〉, 頁 60。

⁴⁵ 但也並非遇上水難,皆會有人喪生或離散,《二刻拍案驚奇》第三十七卷〈疊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顯靈〉,徽州商人程宰因海神「與郎有夙緣,故來相就耳」,因此當程宰在懷安 府高郵湖遇上水難時,海神特別出手相救。

要遣人追趕,船隻必需準備多艘,但雇船買船皆須費用,且水路縱橫交錯,實難尋覓,在小說中也較少見到雇船追人的情節;另一方面,小說作者亦可藉由沿河道搭船避難的情節,衍生出更爲曲折或是巧合的故事。《鼓掌絕塵・風集》中,杜開先與韓玉姿相遇於西水攤頭,二人隔船和詩,此爲才子佳人相遇的典型場景;後來二人私會,疑爲他人發現,故搭船私奔避難,即從「西水攤頭下了船,筆直一條水路,直通得到長沙府去。」順風航行「不上三兩個時辰,約行了一百多里」,先至雙仙鎮,後又搭乘便船,「渡去有三十餘里,將近午牌時分,就到了長沙道」,小說於逃難過程中還寫出一段與船家議價的畫面。這條逃難水路除了表現才子佳人落難的重要功能之外,另一方面,則是安排杜開先與其生父舒石芝相遇。

藉由乘船避難的小說,還可見《鼓掌絕塵・月集》第三十三回,浪跡洛陽的張秀,在脫除一場大禍後,乘一艘便船,星夜回到金陵避難。〈避豪惡懦夫遠竄,感夢兆孝子逢親〉(《型世言》第九回)的王喜,爲避崔科之難,「走到臨清,頂了一個江西糧舡的外水缺,一路牽扯到通灣」,後來更行陸路出山海關。王喜藉由水路避難之事,使小說轉而描述王喜歷經大難(擔任督兵旗牌,隨義兵征戰韃子大敗)及大驚(夜叉食戰場屍體,觀音顯靈解救)、隨大慈入慧日寺剃度出家、兒子王原尋親遇海難卻巧逢王喜等情節。而〈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喻世明言》第三十九卷)中,作者寫汪革憑靠水路逃避官府追緝的情景,甚爲精彩,先是「逕投望江縣天荒湖,取五隻漁船,分載人口,搖向蘆葦深處躲」,後從湖入江,順流東去,並將五隻漁船換成兩隻大船,然後以「王中一」假名瞞過盤詰行船的軍官,最後逕下太湖。

乘船避難在小說裡頭的用意,主要是藉由順風時加快里程的便捷性,可以在短時間之中,拉長空間的距離,並與冤家不再碰頭照面。也就是說,在這過程中,時間概念顯得較不重要,而是藉由空間距離的拉長來迅速免除禍端;當然,空間距離的拉長,最終也可增長冤家尋人的時間,但這必須在小說繼續往後發展,才能清楚凸顯時間跨度。上文所提及杜開先、張秀、王喜及汪革諸例中,可以清楚看見以空間距離迅速避難,並進一步爭取時間的情節策略,但中國古典小說絕大多數的結局屬於封閉式結構,亦即在隨情節搬

演時,會逐漸地處理收束小說中所出現的人物,給予各個人物結局或交代。 是故,無論如何依靠水域空間避難者,最終還是必須接受作者的安排,不會 因為逃難成功而置之不理。

此外,話本作者中亦曾利用水域空間施行「埋跡」之舉,如《珍珠舶》 卷六的證空及陸氏爲避丘大,二人隨路換船,埋跡西湖;〈馬玉貞汲水遇情 郎〉(《歡喜冤家》第十五回)的宋仁與馬玉貞,亦私奔至杭州西湖,埋跡此 處。在〈馬玉貞汲水遇情郎〉中,宋仁與馬玉貞二人從浙江溫州府永嘉縣, 私奔至杭州西湖,埋跡此處,但因二人生活漸呈困頓,故開設「私窠子」, 卻被偶至西湖遊覽的周全撞見。宋、馬二人埋跡西湖的情節,從而衍生出楊 祿詐騙、王文入獄、周全告官的情節。「埋跡」及「匿藏他人」都含有少量 「避難」成分,而「避難」的用意也往往在於「埋跡」,但這之間仍有些許 差異,即「避難」乃是已知遭逢災禍,故即刻逃避事發現場;「埋跡」並非 知道遭逢災禍,而是遠去他方,期望穩當生活。藉由水域空間行「埋跡」之 事,在小說中的構設用意,與「避難」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均是藉由空間距 離拉長時間敘事,以便作者可以於中增展支線情節,追求情節的戲劇性,並 造成懸念。另外,空間距離亦是可使讀者切身體會其遠近問題,其中所刻意 編排而入的情節,更讓整個故事合情合理,而非突兀,如《珍珠舶》卷六中, 陸氏向證空提議乘船逃至他舟外府,原欲「你行醫業,我做針線相幫,儘足 快活過日」,然此舉則衍生丈夫趙誠甫控訴丘大用強逼姦一案。

「逢禍」方面,最常見的天災人禍即是水難及盜賊,特別是貿易商人, 〈遭風遇盜致奇贏,讓本還財成巨富〉的楊百萬「原以飄洋起家,後來曉得 飄洋是樁險事,就回過頭來,坐在家中,單以放債爲事」,作者並沒有說明 何爲「險事」,但就秦世芳經商過程看來,應當是指天候不佳及遭逢盜劫。「避 難」方面,則可見小說人物遠走他鄉,希冀藉此躲避奇禍,化險爲夷,在場 景上較爲單一,未若「逢禍」可以派生出多種頗具精彩度的「案發現場」, 但作者關注的是因爲「避難」所產生的後續效應,亦即避難者日後將面臨的 種種際遇。整體而言,水域空間上的「逢禍」與「避難」可謂是兩面一體, 即是論者所言「一種對戲劇性情節的追求」,特別是「中國小說長期形成的 傳奇記異的傳統,對情節的戲劇性要求甚高」,說話藝術的影響造就讀者對情節的期待,但也使得「中國古代讀者對小說情節的審美要求是合情合理,作者爲了彌補故事的不合理性,或者爲了增強故事的可信度,往往在舖墊、照應、導引、生發、渲染、餘波上花功夫」,並使之擁有情節的完整,讓開端、發展、高潮、結局,了了分明。46水域空間上的「逢禍」及「避難」往往處於情節的發展或高潮,如費人龍、秦鳳儀、秦世芳之遇盜及杜開先、王喜之避難,乃處於發展階段,以承接轉折往後情節;而李天造父子第二次的水難及汪革借水路遁逃,則可見高潮之處,隨即邁入結局。

(3) 匿藏他人及棄屍

話本作者中也會利用水域空間行「匿藏他人」或「棄屍」之事。「匿藏他人」則如〈悍婦計去孀姑,孝子生還老母〉(《型世言》第三回)中,媳婦掌珠與徐婆合作,趁丈夫周于倫出外經商,將婆婆盛氏嫁與章家,此段路程從直隸蘇州至浙江桐鄉,小說中全沿水路;〈日宜園九月牡丹開〉(《歡喜冤家》第五回)的元娘,則遭蔣青擄至船上,一路載到河南南陽府鎮平縣藏匿;前文所提及的費人龍,亦曾因醉後,遭人秘密送至他處,藉此匿藏。以水域空間行「棄屍」之舉者,則可見〈一文錢小隙造奇冤〉(《醒世恆言》卷三十三)的王公及小二將楊氏屍體「不管三七二十一,撇在河邊」;〈花二娘巧智認情郎〉(《歡喜冤家》第一回)的花二把李二屍首棄入官河,而《雲仙笑·厚德報》的朱恩將虞信之屍體推入水中。

這些橋段安排是可以左右小說後續發展,並得以鋪陳令讀者感到出人意 表的情節,或是敷衍一齣拔尖高潮的戲碼。如〈悍婦計去孀姑,孝子生還老母〉,前半段情節主要鋪述婆媳間的不合,中間則是開始安排如何「計去孀姑」,且藉由船運,一路送至桐鄉,盛氏一句「不若且偷生,待遇熟人,叫兒子來贖我」,則成伏筆,暗示小說後半段周干倫尋母之舉。

而《雲仙笑・厚徳報》中、則是寫刁星將虞信之屍體、欲以懸樑自盡之

⁴⁶ 陸志平、吳功正著(1993),《小說美學》,頁 76-77。

法,構陷張昌德,朱恩發現虞信之屍體掛于張昌伯府外,爲求報恩,將屍體推入水中,卻從中衍生出一段公案。〈花二娘巧智認情郎〉中,花二失手殺了李二,將裝屍首的袋子「撇在官河內」,竟使「只因舌尖口快,又貪著五兩銀子,竟要害人性命」的周裁縫遭逢死無葬身之地的報應。以水域空間行「棄屍」之舉,有別於上文所提及的透過空間距離拓展或拉長時間敘事,反而是立即開啟後續情節發展,亦即朱恩及花二棄屍雖分別產生兩種不同形式(前者乃使張昌德免奇禍,並讓殺人者刁星認罪服誅,後者則讓花二夫婦改正陋習,並讓預謀者李二自食惡果),但此事於小說中,前者置於中段,後者置於末段,卻讓情節迅速指向結局,帶有轉折性作用。

(4) 自殺

將水域空間構設爲自殺場所的小說作品,爲數不少,可見者如前文提及的元娘被擴至船上,曾想投水自盡;《人中畫·狹路逢》的傅氏因難忍萬衙污辱,投水自盡,爲李春榮攔阻搭救;〈悍婦計去孀姑,孝子生還老母〉的盛氏得知遭媳婦掌珠設計嫁與他人後,思及爲子守寡二十年,如今功虧一簣,曾欲「打帳向河中跳」;〈捐金有意憐窮,卜屯無心得地〉(《型世言》第十九回)的支佩德妻子也曾因拒絕當作抵債品,趕到渡頭,欲投水自殺;而《珍珠舶》卷二第一回中,揚州府江都縣金生渡江至蘇遊玩,因感「生既已不辰,要這窮命何用」,曾心生投水而死的念頭,後爲社友張赤城一把拖住。以上數篇小說人物,在行將投水自盡前,皆有他人及時出手相救,這些故事基本上還是不脫「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的仁義思維,在後續發展上,亦均獲得良善的回報。

但並非每回小說人物皆有如此完善的結局,〈兩房妻暗中雙錯認〉(《歡喜冤家》第十三回)的王小二在酗酒後,說些輕薄無理之語,「自知不是,到夜深跳入江中死了」,此事驚動官府,判朱子貴等人當「速取燒埋」。此篇小說主要告誡讀者「多言」或「失言」之舉,可能招致殺生之禍。〈胡總制巧用華棣卿,王翠翹死報徐明山〉(《型世言》第七回)的海賊徐明山,遭臨伏兵突擊時,情急之下,「便向河中一跳」,命付波臣,從而衍生「翹死義」的

結局。而〈木知日真托妻寄子〉的安僮,幾經跋山涉水,行至四川,將江仁計姦主母之事訴語木知日後,卻遭「盛怒而笞」,安僮在「力行川廣,辛勞已極,又獲重責,痛苦在心。欲待回歸,又無盤費。倘是歸家,必遭逃走之刑」的情況下,「走至川河口,縱身一躍,死於川河」。然小說在此情節有所轉折:安僮卒後,一靈不散,冤魂歸至休寧,附身江仁,使之跳入下汶溪,以報川河之恨。前文談到的杜十娘,因知原欲寄託終生的李甲,將其轉讓給孫富,在一段「妾不負郎君,郎君自負妾」的痛罵語後,「抱持寶匣,向江心一跳。眾人急呼撈救。但見雲暗江心,波濤滾滾,杳無蹤影。可惜一個如花似玉的名姬,一旦葬於江魚之腹」。杜十娘雖葬身江河,然小說最後乃以托夢柳遇春,並贈與明珠異寶作結。47

前文提及,因遭逢水難、命喪江河者,繁衍成冤魂托夢或鬼魂回報主恩的情節模式;此處投江自盡、付之波臣者,除了構設出上例安僮冤魂復仇、杜十娘托夢報恩之外,尚有名列仙籍的模式,如〈胡總制巧用華棣卿,王翠翹死報徐明山〉的王翠翹因對當初勸誡徐明山歸降,卻遭設計突擊一事感到愧疚,又爲報明山知遇之恩,在悲歌二曲後,奮身投入江中,尸隨潮而上,得於曹娥渡,面色如生。卒後的王翠翹,入夢於渡曹娥江而過的華旗牌,訴與「上帝憫予烈,且嘉予有生全兩浙功德,特授予忠烈先媛,佐天妃主東海諸洋」。通過杜十娘及王翆翹的故事,可以看出二女雖皆曾身落妓戶,但因其行爲舉措令旁觀者激賞,並敬重其節義精神,妓戶身分此時已消除藩籬,特凸顯其道德人格的一面。48

⁴⁷ 明清話本當中,作者常將神異鬼怪的情節安插其中,學者針對此舉,紛紛提出評論,但多數因含果報之說,故評價不高,如賈文昭、徐召勛著(1984)《中國古典小說藝術欣賞》即言「迷信的奇或荒誕的奇,在過去就毫無積極意義或純屬糟粕」(頁 134)。這實可視爲明清話本一大特色,蓋因作者爲使小說情節能夠繼續鋪展下去,並從中宣揚善惡有報的道德理念,借助無形且不可測的鬼神,乃爲最佳策略。何況,在部分小說當中,將鬼神之事書寫入小說之中,卻可添加神祕色彩,並增可讀性,甚至可使情節更無破綻性,具有故事完整性的作用。

⁴⁸ 王翠翹在小說中被稱之爲「義俠女子」,主要是在於「死報徐明山」,其「投河自盡」乃感 念對徐明山情義之重,可謂是「婦爲夫死」的另一種極致表現;而杜十娘則基於「堅守盟

在上述諸篇小說當中,投河自殺的行爲,主要出現於全篇小說結尾,如 王小二之死乃欲將全篇小說所述「兩房妻暗中雙錯認」之事,藉由官府之力, 釐斷此事;杜十娘怒沈百寶箱除藉由詛咒的力量,以報己身遭負心之恨外, 另一作用則是交代柳遇春之事,使其結構更爲完整;而王翠翹死報徐明山, 則是爲驗證「胡公誅降,復至於死,上帝以奪其祿,命斃於獄」。此外,尚 有爲收束小說中某項事件而設,如安僮投江,即欲借其冤魂,收束江仁「朋 友無信」的情節及其報應;徐明山投江自盡,用意則在作爲海寇已除的象徵。

(5) 偶遇

水域空間在明清話本中,常爲作者構設安排進入情節,並起結構作用者,當屬「偶遇」。水道交通便利,且可藉此往返兩地、經商旅遊,一舟即可行遍天下,與車輿等交通工具相比,皆較爲便利。水域空間上的「偶遇」形式頗多,如「泊舟相徬」即爲一種,所謂「泊舟相徬」蓋指船行至某處已是夜晚,因夜間行船風險較高,49故覓一地點或特定港灣,舟泊於此,稍事休息,待隔日清辰起舟。而這一地點或特定港灣,同時可能也有多艘船隻停泊於此,藉由船隻與船隻的相互依泊,以消除風浪晃蕩。本船因與他船相互依徬,因此增加了兩船之人相互攀談認識的可能性,「偶遇」狀況由此而生。《珍珠舶》卷四第一回寫道謝賓又「舟次洞庭湖,隨著眾船舶於浦口」,即偶遇杜公亮,且「跳過船去,走進艙內」,二人煖酒對酌。《鼓掌絕塵》第二回中,杜開先的船隻與韓相國的畫船玉鳧舟,同泊於西水灘頭,全回極力描寫杜開先與韓玉姿相遇且隔船和詩的情形。

「同舟共渡」又是一種形式,《鼓掌絕塵》第三十三回寫張秀脫難後, 乘著一艘便船,星夜回到金陵,在船上偶遇舊友陳通;《人中畫·自作孽》

誓」,不肯因千金之寶被扣上「婦人水性無常」罪名,獲稱「千古女俠」,作者於其中仍隱約強調女子「從一而終」的態度。以上說法參見郭璉謙(2007),《「原俠」的承續與開創:明清話本中的「俠」》,頁62、68、72。

⁴⁹ 明·程春宇(2006),《士商類要》,卷之二〈爲客十要〉中即載「凡行船,宜早灣泊口岸,切不可圖快夜行。」(頁 359)

第二回則是寫汪費欲雇船至江西,但舡家「因價錢少不肯去」,使勢痛打,此時正好巧遇欲至江西的代巡,幫貼銀兩,同舟共渡。其餘在水域空間上偶遇的模式者,還可見如〈濟窮途俠士捐金,重報施賢紳取義〉(《醉醒石》第十回)的浦肫夫船舟將至五龍港時,巧逢遭劫船隻橫在岸邊,並遇上三位在此被盜、往返無資的舉人;《人中畫·寒徹骨》第一回中,居於西湖的柳春蔭,其因感身世飄零的哭泣聲,驚動「沿著長堤一帶步月賞玩」的商尚書,兩人由此相識;〈唐解元一笑姻緣〉(《警世通言》第二十六卷)中,搭船遊於閶門的唐伯虎,忽見乘於畫舫中「眉目秀豔,體態綽約」的秋香對他掩口而笑;〈馬玉貞汲水遇情郎〉的周全,則於一次遊覽西湖時,偶見避居於此的馬玉貞。《人中畫·狹路逢》及〈避豪惡懦夫遠竄,感夢兆孝子逢親〉中的偶遇形式則在於兒子遭逢水難,漂至一處,於廟中參拜時,碰巧覓得父親。

水域空間上的「偶遇」情況頗多,上文僅略舉數例,在此要關注的是:「偶遇」對於小說情節的進展,有何作用?古諺所云「百年修得同船渡」,重點在於凸顯「緣」,而在同船渡過程中或是同一水域空間裡,還可偶遇,更是「緣」的展示,但此類偶遇之緣,對小說作者鋪陳情節而言,常起轉折性的效果。如上文提及的謝賓又與杜公亮偶遇,小說藉此展演出謝賓又與杜仙珮的才子佳人及英雄救美的情節;其中,因偶遇而敷演出才子佳人篇章的小說作品,爲數頗多,如杜開先與韓玉姿、唐伯虎與秋香等皆爲此類。以往論及才子佳人小說時,都會著重「才子佳人如何相遇」的關目,50小說中常有才子受高官鄉宦或富貴人家賞識,偶遇某處,延入宅院讀書以取功名的情節,此段情節其實不可忽視,蓋因明清話本中常因「巧合」成書,而此種「偶遇」乃是才子佳人巧合情節的導火線。

除此之外,偶遇還常牽引著小說人物的人生際遇。謝賓又、杜開先、柳 春蔭等人的故事,大抵不脫力備科考、奮跡青雲,故水域空間上的偶遇對其

⁵⁰ 才子佳人如何相遇?苗壯(1993)在《才子佳人小說史話》提出「邂逅相逢,一見鍾情」的遇合模式(頁 94);蘇建新(2006)於《中國才子佳人小說演變史》則精細分出七類邂逅、相逢的模式(頁 153-155),其中還包含「乘船或在水邊徜徉」。

人生際遇,產生莫大助益。浦肫夫資助遭受搶劫的三位舉人,使其得以入京參與科考,但其背後意含則在強調此種萍水相逢、濟困救厄之舉,讓浦肫夫逃離一場牢獄之災。至如張秀偶遇陳通,從中衍生的人生際遇更是甚爲精彩,其中還提及勾欄、教坊司、小官、元宵夜等場景及文化現象,描摹均甚爲生動。以上人物的際遇雖曾歷經苦難,但最終皆甚良善,至於汪費船上遇代巡、周全西湖遇馬玉貞,前者則使汪費丢官,後者則了結王文冤案,未妨視爲替他人解決一大禍胎之舉。總體來說,「偶遇」象徵的是「巧合」,亦即藉由某些人牽扯出下一事件,事件與事件相連,構合成一篇小說,論者常謂中國的古典小說著重情節發展,「偶遇」可視爲切入點之一。此外,水域空間的偶遇,有時也提醒讀者「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否則將攬禍上身或誤害他人,如〈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即是一例,李甲與孫富二人相遇江上,但卻過於相信孫富,致使紅顏喪命,並禍延己身。

由上文分析看來,水域空間在明清話本中的構設,對於情節發展所衍生而出的方向,具有載舟/覆舟之雙面刃特質,如潘璘乘船經商,原是載舟之旅,回程時卻成禍延己身的覆舟災厄,而秦鳳儀、費人龍船上遇盜,看似覆舟,實則爲遠離困窘的載舟情節。如此而言,所謂載舟/覆舟之雙面刃特質,在小說看來,無法以發生在水域空間上的當下情境作爲判準,而是需將整篇小說情勢發展視爲有機整體,方能瞭解水域空間置於其中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另外,水域空間上「鋪陳情節使用」之事通常發生於主角身上,但有部分作品以次要人物爲主,並構成阻礙,爲了掃除這些阻礙,這些次要人物成爲葉慶炳所言「在人物處理上難免出現需要時招之即來、不需要時揮之即去的現象」,51如盜賊水裏龍、因自殺身亡的王小二、遭友殺害的潘璘,均屬於此種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次要人物,但這些次要人物在水域空間的出場及事件,實乃影響整篇小說的佈局,確如金聖嘆評點《水滸傳》所言「借勺水

⁵¹ 葉慶炳(1985)於〈短篇話本的常用佈局〉一文中,將短篇話本常用佈局分成進展、阻礙、完成三部分,由於故事的每一階段,都要安排阻礙,故在人物處理上難免出現需要時招之即來、不需要時揮之即去的現象。(頁 181-182)

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三卷第二期

興洪波」,52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

最後,上文分析水域空間在「鋪陳情節使用」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多數小說情節乃因「巧合」而得以延續開展。「巧合」的情節安排,在中西小說戲劇中屢見不鮮,林鶴宜即簡阨地提出「『誤會』和『巧合』在眞實的人生中,只有偶然的事件。當它被吸收到『故事』裡頭,它就變成製造高潮,出人意表的必然性手法。在一切的藝術中,凡是含有『故事』成分的類型,如民間傳說、小說、說唱、戲劇等。都必然地會採用『誤會』和『巧合』來推波助瀾,添姿生色。」53小說家爲了使故事產生驚奇感,往往會採用「巧合」的方式處理情節,把現實生活的機緣表現出來,但是巧合必須要有邏輯性,否則就會顯得虛假:作家會用心布置偶然的事件、機會、場合,使得故事或人物性格得以必然發展。54簡單來說,小說作者即是運用「巧合」達成「常中出奇」55的情節。論者常謂中國古典小說受到史傳傳統影響甚深,56但這是在敘事筆法及精神內涵上而言。史書著重史實載錄,很難憑空出奇,以「巧合」接引情節;明清話本雖然也受史傳傳統影響,特別強調故事的眞實性,但若一味遵循史傳傳統的實載路線,恐怕成爲枯燥乏味的補史之作,難以獲得讀者青睞。因此,「巧合」成爲中國古典小說在繼承史傳傳統時,爲

⁵² 明·施耐庵著,金聖嘆評改(1994),《第五才子書水滸傳》,第四十三回〈錦豹子小徑逢戴宗, 病關所長街遇石秀〉夾批,頁 2462

⁵³ 林鶴宜(1989),〈阮大鍼對「錯認」「巧合」編劇手法的運用〉,頁 265。

⁵⁴ 方元珍等著(2006),《古典短篇小說選讀》,頁 34。

⁵⁵ 黃清泉等著(1995)《明清小說的藝術世界》中認爲明清白話短篇小說的美學特徵可以概括爲「常中出奇」,所謂「常中出奇」即是「從普通的日常生活中提鍊奇異驚人的情節,而又更加深刻地揭示了生活的真實,更加凝煉地總結了生活的規律」(頁 146),但這其中「仍能保持住作品的真實性、可信性」(頁 148)。

⁵⁶ 如陳平原(2003)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指出「史傳傳統」與「詩騷傳統」乃以「作為整體的歷史編纂形式與抒情詩傳統」(頁 209),影響中國小說形式發展,並認為「自司馬遷創立紀傳體,進一步發展歷史散文寫人敘事的藝術手法,史書也的確為小說描寫提供了可資直接借鑒的樣版」(頁 210);楊義(2004)《中國古典小說史論》中認為「從小說發生學著眼,神話和子書的作用相當顯著;從小說長期演變和成熟上看,史書影響則更爲深遠」(頁 20)。

了使情節可以發展延伸,而有別於史傳傳統的元素,尤其在明清話本中,想要在「頃刻間提破」,若無借助「巧合」的力量,將難以爲繼,故前文所言作爲「鋪陳情節使用」的水域空間,其中遇盜、遇害、偶遇,乃至於朱恩忽見慮信之屍體,均是從偶然性完成必然性的「巧合」情節。

4. 結論

明清時期,水運空間發達,促成商業經濟發展及各地文化交流,而在小說當中,亦可看見作者常將江河湖海此類「水域空間」寫入其中,而做爲水域空間上的交通工具「船」,也成爲水域空間的象徵。本文試圖探討「水域空間」及「船」在明清小說中的構設,並分成兩方面作爲考察方向,一爲水域空間在小說中的正常使用,以「兩地往返」、「旅遊觀光」、「商旅貿易」及「任途宦遊」爲主。從中雖可看出小說作者藉以以船及水域空間,將陸地空間及其小說情節進行穿針引線的縫合動作,但也進一步觀察作者雖往往僅是輕描淡寫這些水域空間,然從水域空間亦可體察到對於明清時期社會、經濟、文化、風俗等面貌。

第二個考察方向則是在水域空間上所發生進行的事件,對於小說情節的 鋪陳起著何種作用或影響?本文列舉出「逢禍」、「避難」、「匿藏他人及棄 屍」、「自殺」、「偶遇」等五點,除了逐一細述小說中水域空間上所發生的事 件外,最重要的還是希望可以藉此關注對於後續情節的影響。也就是說,水 域空間上的行爲動作,雖然僅爲一個小點,但卻往往成爲作者用來鋪陳後續 情節的轉折點。至於何以選擇水域空間作爲一轉折點,本文則認爲蓋因水路 發達,河道網路交錯,一經順風而行,則可行避禍之舉,但若是逆風,又可 爲逢難之用;倘若水流湍急或船隻顚簸,又遇上夜間行船,作者則可施行殺 人情境及棄屍功能,另一方面,還可藉此鋪述神道鬼異之用,以宣揚仁義道 德。

本文以「水域空間」在明清話本中的構設進行考察,雖然「水域空間」

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三卷第二期

在小說中僅是全篇故事的一個小點、一個場景,但從中卻可藉以瞭解「水域空間」所呈現明清時代的社會生活圖像,他們善用水域空間的便利性,但又 畏懼水域空間爲生命帶來不可預測之事。

最後,本文所討論的小說篇章,由明至清,歷經易代變革,就小說史而言,作品實有不同風貌。基於此考量,原欲依作品創作時間,予以區隔分論,但在實際進行文本分析後,發現若以探討水域空間在話本中的構設,特別是聚焦於水域空間的構設對於小說情節結構有何影響,在明清二代的話本中,其實主要在於描繪精粗的區別,無論是動態環境或靜態環境,皆是如此。故本文打破時間區隔,以「共通處」爲論述中心,閱讀水域空間在明清話本中所共有的構設,至於「歧異處」,則留待日後專文處理。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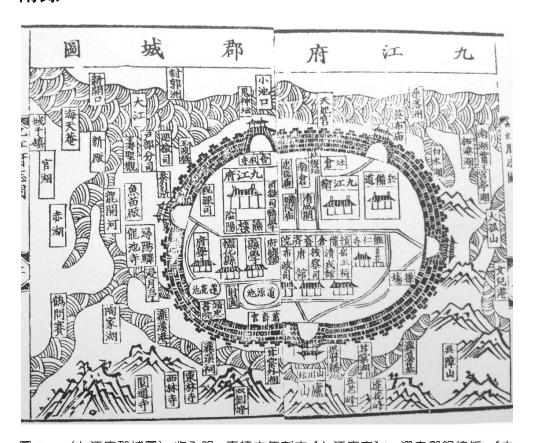


圖 1: 〈九江府郡城圖〉(收入明·嘉靖六年刻本《九江府志》),選自鄭錫煌編:《中國古代地圖集:城市地圖》(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4年10月),頁93。 圖中可見四周環河,西側則有「潯陽驛」。

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三卷第二期



圖 2: 清·徐揚於乾隆二十四年繪〈盛世滋生圖〉(又名〈姑蘇繁華圖〉,現藏於遼 寧省博物館)之一景,圖中可見干帆競相靠岸,然後從右方城門入城。



圖 3: 清·陳玫等人於乾隆元年繪〈清明上河圖〉(現藏臺灣故宮博物院)之一景, 圖中可見船泊於岸邊碼頭,另有一艘船則由上方水匣入城。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古籍

- 明·馮夢龍,《喻世明言》,臺北:河洛出版社,1980。
- 明·馮夢龍,《醒世恆言》,臺北:河洛出版社,1980。
-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臺北:河洛出版社,1980。
- 明·淩濛初,《拍案驚奇》,臺北:河洛出版社,1980。
- 明·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臺北:河洛出版社,1980。
- 明·陸人龍編撰,陳慶浩點校,《型世言》,《話本小說大系》,南京:江蘇古籍,1993,冊13。
- 明·西湖漁隱主人,《歡喜冤家》,收入《思無邪匯寶》(11)(12),臺北:臺灣 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1994,冊 12。
- 明·不題撰人,趙伯陶校點,《人中畫》,《話本小說大系》,南京:江蘇古籍, 1993。
- 明·古吳金木散人,《鼓掌絕塵》,上海:上海古籍,1994,《古本小說集成》 影印崇禎4年蘇州龔氏刊本。
- 明·施耐庵著,金聖嘆評改,《第五才子書水滸傳》,上海:上海古籍,1994, 《古本小說集成》據中華書局 1975 年影印金閻葉瑤池梓行「貫華堂 古本」影印。
- 明·黃汴,《一統路程圖記》,收入楊正泰《明代驛站考(增訂本)》附錄二, 上海:上海古籍,2006。
- 明·程春宇,《士商類要》,收入楊正泰《明代驛站考(增訂本)》附錄二,上海:上海古籍,2006。
-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臺北:偉文圖書,1976。
- 明·李培等修,黃洪憲等纂,《浙江省秀水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中國地方叢書·華中地區》第五七號,影印明萬曆 24 年修、民國 14 年鉛字重刊本。
- 明·王十件撰,呂景琳校點,《廣志繹》,收入《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

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三卷第二期

中華書局,1997。

- 清·鴛湖煙水散人著,丁炳麟校點,《珍珠舶》,《話本小說大系》,南京:江蘇古籍,1993,冊12。
- 清·天花主人,《雲仙笑》,上海:上海古籍,1994,《古本小說集成》影印 清初刊本。
- 清·嗤嗤道人,《警寤鐘》,上海:上海古籍,1994,《古本小說集成》影印 北大圖書館藏萬卷樓本。
- 清·谷口生編次,《生綃剪》,上海:上海古籍,1994,《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清初原刻本。
- 清·李漁,《連城璧》,上海:上海古籍,1994,《古本小說集成》影印大連 圖書館抄本。
- 清·張廷玉等敕修,《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7。
- 清·丁謙,《明史外國傳地理考證》,收入《叢書集成三編》之27,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
- 清·王應奎撰,王彬、嚴英俊點校,《柳南隨筆》,收入《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北京:中華書局,1997。

中文部分--論著

- 王文進 (1997),〈南朝「山水詩」中「遊覽」與「行旅」的區分——以《文 選》爲主的觀察〉,《東華人文學報》,1,頁 104-113。
- 王國瓔 (1986),《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王鴻泰 (1999),《禮教與情慾:前近代中國文化後/現代性》,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方元珍、陳碧月、許應華 (2006),《古典短篇小說選讀》,臺北:國立空中大學。
- 白壽彝 (1984),《中國交通史》,上海:上海書店。
- 司馬中原 (2008),《冰窟窿》,臺北:風雲時代。
- 米克·巴爾(Mieke Bal)著,譚君強譯,(2005),《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第

二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安作璋主編 (2001),《中國運河文化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巫仁恕 (2008),《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李桂奎 (2008),《元明小說敘事型態與物欲世態》,上海:上海古籍。

宋莉華 (2004),《明清時期的小說傳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吳毓琪 (2006),《康熙時期臺灣宦遊詩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 所博士論文。

林仁川 (1987),《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林利隆 (2005),《明人的舟遊生活:南方文人水上生活文化的開展》,宜蘭: 明史研究小組。

周振鶴 (2005),〈從明人文集看晚明旅遊風氣及其與地理學的關係〉,《復旦 學報(社會科學版)》,1,頁72-78。

林鶴宜 (1989),《小說戲曲研究第二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金健人 (1988),《小說結構美學》,臺北:木鐸出版社。

邱紹雄 (2004),《中國商賈小說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苗 壯 (1993),《才子佳人小說史話》,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胡雅敏 (2004),《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范宜如 (2007),〈華夏邊緣的觀察視域:王士性《廣志繹》的異文化敘述與 地理想像〉,《國文學報》,42,頁 121-151。

唐 琰 (2008)、〈明清小說視野中的海洋發展〉、《明清小說研究》3、頁 31-42。

張嘉昕 (2004),《明人的旅遊生活》,宜蘭:明史研究小組。

陳平原 (2003),《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陳璧顯主編 (2001)、《中國大運河史》、北京:中華書局。

章必功 (1992),《中國旅遊史》,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陸志平、吳功正 (1993)、《小說美學》,臺北:五南圖書。

郭璉謙 (2007),《「原俠」的承續與開創:明清話本中的「俠」》,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三卷第二期

黃清泉、蔣松源、譚邦和 (1995)、《明清小說的藝術世界》、臺北:洪葉文化。

楊 義 (2004),《中國古典小說史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楊正泰 (2006),《明代驛站考(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

賈文昭、徐召勛 (1984),《中國古典小說藝術欣賞》,臺北:里仁書局。

葛永海 (2004),《古代小說與城市文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葉慶炳 (1985),《古典小說評論》,臺北:幼獅文化。

趙軼峰 (2001),〈晚明士子和妓女的交往與儒家傳統〉,《中國史研究》,4, 頁 143-156。

趙維平 (2007),《明清小說與運河文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魯傳鼎(1985),《中國貿易史》,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邁克·克朗(Mike Crang)著,楊淑華等譯,(2005),《文化地理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譚其驤 (1991),〈積極發展歷史人文地理研究〉,《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1,頁30-33。

蘇同炳 (1969),《明代驛站制度》,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蘇建新 (2006)、《中國才子佳人小說演變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龔鵬程 (1996)、〈遊人記遊:論晚明小品遊記〉、《中華學苑》、48、頁 39-64。

Sailing on the River: The Conception of "Water Space" in the Hua Be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en-Chien Kuo*

Abstract

Few studies have discussed the conception of "water space" in novels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plot structure of novels. Since water transport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plot of "water space" could be frequently found in classical novels, several issues can be investigated: How did authors effectively make use of water space to form the plots of novels? Would the incidents occurred at water space affect the development novels or simply act as transportation method? This study intended to investigate the questions above.

The publication of Hua Be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s in the largest amount. This study selects several classical novels San Yan Liang Pai (三言兩拍), Xing Shi Yan (型世言), Huan Xi Yuan Jia (歡喜冤家), Ren Zhong Hua (人中畫), Gu Zhang Jue Cheng (鼓掌絕塵), Zheng Zhu Bo (珍珠舶), Yun Xian Xiao (雲仙笑), Jing Wu Zhong (警寤鐘), Sheng Xiao Jian (生綃剪), and Lian Cheng Bi (連城壁) as research materials and inspects the descriptions concerning "traveling," "running business," "official career," and "commuting between two places" to explain the "normal function" of water space in novel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phenomena of "taking refugee," "encountering disaster," "hiding suspects," "abandoning corpse," and "casual meeting" to further investigate how novelists used the conception of water space to facilitate plot formation.

Keywords: Classical Novel, Hua Ben, Simulant Hua Ben, Water Space, Plot Structure

^{*} Ph.D candidat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Lecturer, School of Liberal Education, Shih Chien University, E-mail: morestand@gmail.com.